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报告2019

2020年9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SHANGHAI ACADEMY
上海研究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 一带一路 " 与上海研究中心 2020 年度专题报告 3

SIIS Task Force Report 2020 No.03

© 版权属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研究院

Copyright © 2020 by the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Shanghai Academy.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hors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数据报告2019

周亦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 春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序言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全面落实中央交予“三大任务”的关键之年。在这个重要的年份,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上海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成为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攻坚克难、先行先试、探索新阶段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践创新已成为上海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其中,如何推进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是上海在当前发展进程中需要直面的新挑战。

中国的发展需要通过制度型开放,降低生产要素跨市场流动壁垒,实现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更有效利用,从而真正实现高质量增长的机制化驱动。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制度开放与国际合作的更有机结合,体现了新一轮开放经济的重要发展趋势。制度开放既有助于降低市场机制下的制度型交易成本,又有利于在公平导向的市场机制下实现内外市场不同资源的互动和互通。

从全球视角讨论上海发展问题,与全球分享上海发展经验和机遇,是上海城市发展和改革能级的重要体现。这个纷繁复杂的变革时代给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出了一道关于如何更好发展的考题,而上海则需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对于新阶段的重大发展问题予以回应。上海的方案将不仅决定自身的发展高度,更是在构建未来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格局的全新架构,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来自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不仅是发展进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更需要运用科学的理念与方法参与到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来,成为时代精神的记录者。这就是我们发布这组研究报告的初衷。

本组系列研究报告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简称“上海研究院”)联合系列研究成果。2019年度系列报告共由四篇组成,分别是:

旗舰报告:

《制度型开放与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自贸区新片区发挥“桥头堡”功能新探索》

专题报告: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报告 2019》

《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之进展与展望》

《上海服务东盟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旗舰报告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角度分析了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深刻变迁。课题组认为,随着全球化发展格局的调整,中国在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技术民族主义和关税壁垒的挑战。并且提

出加强制度型开放是中国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重要举措。课题组指出,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开发是当前中国开创制度创新,落实试验型经济政策的重要改革抓手,可充分发挥新实体经济发展引领和促进产业安全的新角色,并以此促进“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

专题报告则分别从“一带一路”建设的数据分析、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和与东盟地区经济合作三个角度,研究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

一直以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团队积极加强与上海市发改委、市商务委、市外办等政府部门之间的调研沟通,采取多种方式对不同途径数据进行系统整合,目前已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健全的数据分析体系,并连续发布研究报告。在2018版的基础上,2019版报告进行了有效的技术更新与维度拓展。

上海科创中心对引领“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目前,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正进入方案细化、分工体系优化和绩效强化的阶段,将成为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动力源。该专题报告集中归纳了科创中心建设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作用。

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样板区域。长期以来,东盟是与上海经贸往来最为密切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上海与东盟的经贸交往正在从单纯的要素往来向制度化合作方向发展。该专题报告总结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上海服务东盟“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在各个领域形成的重要成果,特别分析了双方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开展机制化合作的关键进展。

此外,“一带一路”与上海研究中心课题组正积极构思后2020时代上海开放型经济建设和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政策方向。有关后疫情时代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系列报告正在研究推进中。

2020年,世纪大灾疫正发挥着“超级放大器”、“超级加速器”和“超级转化器”的功能,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也加速了世界的变革。“一带一路”建设又将如何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实现合作共赢?又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2020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7个年头,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上海基本建成“四个中心”的收官之年。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海该如何在内外挑战中突围,“一带一路”建设又该如何实现优化布局,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城市功能的转型定位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长远未来,更关乎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每个参与其中的研究者都肩负重大使命,我们责无旁贷,将戮力同心,以尽绵薄。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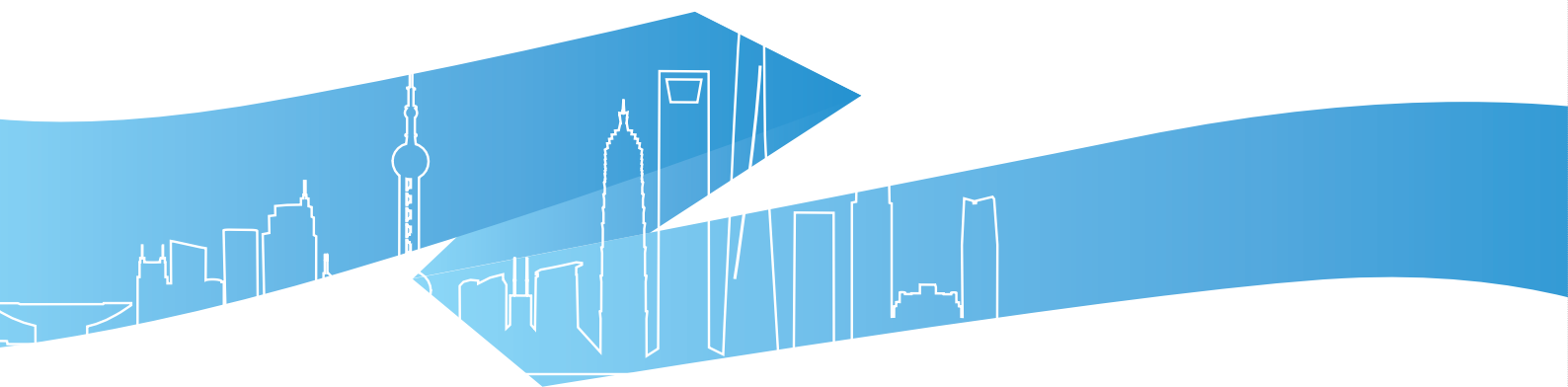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2020年9月

摘要

在 2019 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了《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报告》(2018 年版)。在去年报告基础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 2020 年再次发布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报告(2019 年版)本年度数据库报告以区域比较为特色,重点比较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成果。通过评估三地在贸易联通、投资互动上的异同,本年度数据分析表明,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特色性略显不足,并且在部分方面与兄弟省市还存在一定差距。本数据库继承了去年的研究特色,将现状分析与影响分析相结合,继续通过数据模型方式测量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的贡献度。根据今年的数据,上海的服务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方位发展依然维持了较好水平,与去年基本保持一致。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上海 数据库 影响分析



2019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首次发布《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报告》，采取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原创的上海参与一带一路数据库，系统评估了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给的基本情况，并且创新性地将现状分析与影响分析相结合描绘了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及其相应影响。在该报告发布后，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评估日益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伴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量化手段的普及，数据分析正成为评估“一带一路”建设成效的重要手段。在去年研究基础上，今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分析团队再次拓宽数据分析广度，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加入分析比较视角，将上海对“一带一路”参与放在区域比较的分析视角下，将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贡献与国内其他部分省区市进行对比，从全局角度进一步探讨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当前定位与未来机遇。

本报告主要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介绍本报告数据分析采取的思路和研究路径，并重点讨论本年度报告数据分析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从现状评估的角度分析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经贸往来与经济投资等维度上的进展，在比较视角下将上海与国内其他省市区进行对比，以识别上海的优势与不足；第三部分继续采用影响分析的方法，进一步讨论在过去一年中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发展的影响和其对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最后一部分，本课题组将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据库建设思路与新亮点

当前有关“一带一路”倡议数据库的建设，已成为众多研究机构关注的重点。在《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报告2018》中，本课题组系统讨论了国内外相关政府机关和研究机构构建的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数据库¹的情况。本课题组认为既有数据库建设存在数据分析层次不够、缺少影响分析及缺乏可推广性等问题。以此为基础，本报告创新性地开发了“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库”，首开从地方视角对“一带一路”建设成效进行数据分析的先河。在今年的“上海

1 当前，国内外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数据库主要有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家信息中心等机构合作建立“一带一路”大数据综合服务门户和国家信息中心先后连续三年发布《“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美国威廉玛丽学院设计的中国对外发展合作数据库也包括了许多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发展援助和对外贸易信息。此外，在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设计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中，也专门设计了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模块。经济学者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也利用其既有的情报分析机构设计了相应的关于“一带一路”项目的专题讨论。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库 V2.0”版本中，一方面延续了 1.0 版本的基本架构，并在其基础上更新数据 (2018)，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数据库的覆盖范围，引入比较视角，从更高站位与更广范围讨论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应内容。

(一) —— 2.0 版本数 据库的新 特色：区 域比较

区域比较是“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库 V2.0”的最主要亮点。在“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库 V1.0”中，研究分析侧重于上海自身的发展，从历史角度回顾了过去数年来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变化。然而，在“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库 V1.0”中，国内其他省区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情况未能得到体现。尽管这不违背本报告的主题，但却使相关讨论失去了重要的参照坐标，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据分析的视野和相应分析结果的推广性。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国内各省区市都掀起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潮，而不同省市区的服务模式和发展阶段都各有特色。因此，只有采取区域比较的方法，才能更客观与理性地判定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程度，了解其优势、特色和不足。“区域比较”视角将为本研究许多积极意义。

第一，区域比较视角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在全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与方向。当前，上海被定位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这既体现了中央对上海工作的肯定，也表明中央对上海发挥特殊作用的期待。本研究通过区域比较的方式，可借助数据分析准确清晰地确定上海与其他地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相似点与差异性，确定上海自身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应特点，并与“桥头堡”的要求进行对标，进一步明确当前成绩与未来的工作方向。

第二，区域比较的视角将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数据分析研究的标准化。当前，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数据分析日渐增多，但除本研究之前提到的问题之外，尚缺乏的统一的分析比较标准，这也是当前“一带一路”倡议数据分析与评估存在的重要问题。数据分析虽然都依托于客观数据，但数据分析的维度、指标的设计等都有很强的主观设计成分。因此，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数据分析，如果缺少基本标准统一意识，就很容易陷入不同地区机构各自为战的局面，使地方参与“一带一路”的评估标准陷入碎片化状态。为避免此情况的出现，本报告今年的数据分析采取区域比较的方式，这也将有利于建立一个更为统一和标准化的“一带一路”倡议服务程度评价体系。

(二) 数据库2.0 基本框架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库 V2.0”延续了 1.0 版本的基本架构。总体数据库分成两部分，分别为现状分析部分和影响分析部分。现状分析侧重于描述上海与国内其他省市区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在其中着重于分析贸易往来和经济投资往来。在贸易方面，“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库 V2.0”与上一版本均以上海海关通关数据为基础。基于当前国内不同城市的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地区海关数据库的标准格式的考虑，本研究还在贸易数据库增加了北京、广州等两个城市的对外贸易数据，可对“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地区进行比较分析，进而辨别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情况和其他两个城市的差别。在投资方面，本研究除继续参考上海市商务委最新出版的《2019 年上海对外经贸投资报告》外，将在 2018 年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技术完整分析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公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相应企业名单，对其来源地进行归类，对当前我国不同地区的境外投资情况进行考察，并与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进行比较，拓展研究视野。

在第二部分影响分析中，本数据库采取与去年类似的架构，重点探讨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相关国家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采取共变效应和固定效应等两类分析模型，从趋势和数量等两方面评估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入所带来的影响。具体来说，本研究将分析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政治治理、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影响，具体测量标准和数据来源均与去年的数据库保持一致。

表 1：本研究数据库相应指标、测量模式和数据来源

衡量维度	涉及指标	测量	数据来源
现状分析	指标 1: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指标	涉及贸易量、进出口金额	上海、北京、广州等三地的海关数据
	指标 2: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指标	投资数量、金额、种类，投资公司	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上海市商委《上海对外经贸合作报告》
	指标 3: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年度总价值指标	参与总投入 = 指标 1+ 指标 2	基于前述贸易和投资数据，本报告将其加以整合

影响分析	指标 4: 经济增长影响指标	<p>指标 4 共变效应模型计算公式:</p> $EGI = \frac{\sum \left(\frac{TV_t}{TV_{t-1}} / \frac{GG_t}{GG_{t-1}} \right) / (-\mu_{EGI})}{\sigma_{EGI}}$ <p>指标 4 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公式:¹</p> $GG_{ct} = \lambda_c + \gamma_t + \beta_{EG} * TV_{ct} + u_{ct}$	经济增长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指标 5: 经济结构转型影响指标	<p>指标 5² 共变效应模型计算公式:</p> $STI = \frac{\sum(TV_t/TV_{t-1})/(IST_t-1/IST_t)-\mu_{STI}}{\sigma_{STI}}$ <p>指标 5 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公式:</p> $IS_{ct} = \lambda_c + \gamma_t + \beta_{STI} * TV_{ct} + u_{ct}$	经济结构变化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指标 6: 政治治理影响指标	<p>指标 6 共变效应模型计算公式:</p> $PSI = \frac{\sum(TV_{t-1}/TV_t)/((WGI_{t-1}/WGI_t)-\mu_{PSI})}{\sigma_{PSI}}$ <p>指标 6 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公式:</p> $WGI_{ct} = \lambda_c + \gamma_t + \beta_{psi} * TV_{ct} + u_{ct}$	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数据库 (World Governance Data)、世界和平研究所“失败国家指数”
	指标 7: 廉洁影响指标	<p>指标 7 共变效应模型计算公式:</p> $AI = \frac{\sum(TV_{t-1}/TV_t)/((TI_{t-1}+PV_{t-1})/(TI_t+PV_t))-\mu_{AI}}{\sigma_{AI}}$ <p>指标 7 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公式:</p> $TI_{ct} = \lambda_c + \gamma_t + \beta_{AI} * TV_{ct} + u_{ct}$	透明国际“腐败认知指数”
	指标 8: 社会稳定影响指标	<p>指标 8 共变效应模型计算公式:</p> $SSI = \frac{\sum(TV_{t-1}/TV_t)/(VNT_{t-1}/VNT_t)-\mu_{SSI}}{\sigma_{SSI}}$ <p>指标 8 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公式:</p> $VN_{ct} = \lambda_c + \gamma_t + \beta_{SSI} * TV_{ct} + u_{ct}$	政体 4 数据库 (Polity IV)
	指标 9: 社会公正影响指标	<p>指标 9 共变效应模型计算公式:</p> $SJI = \frac{\sum TV_{t-1}/TV_t)/(UE_{t-1}/UE_t)-\mu_{SJI}}{\sigma_{SJI}}$ <p>指标 9 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公式:</p> $UE_{ct} = \lambda_c + \gamma_t + \beta_{SJI} * TV_{ct} + u_{ct}$	世界和平研究所的“失败国家指数”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1 EGI 代表经济增长影响, I 代表投资, GG 代表 GDP 增长率; c 代表国家, t 代表时间 (当前年份), t-1 代表上一年份; λ_c 代表国家的固定效用系数, γ_t 代表对时间的固定效用系数, 得出的影响系数是 β_{EG} , u_{ct} 代表残差; μ 代表平均数, σ 代表方差 (下文相同)。

2 STI 代表经济结构转型影响, IS 代表工业在 GDP 中所占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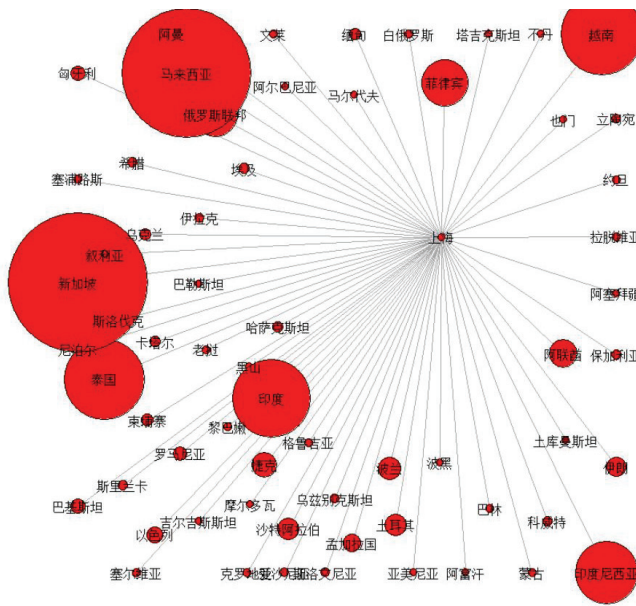


上海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绩效 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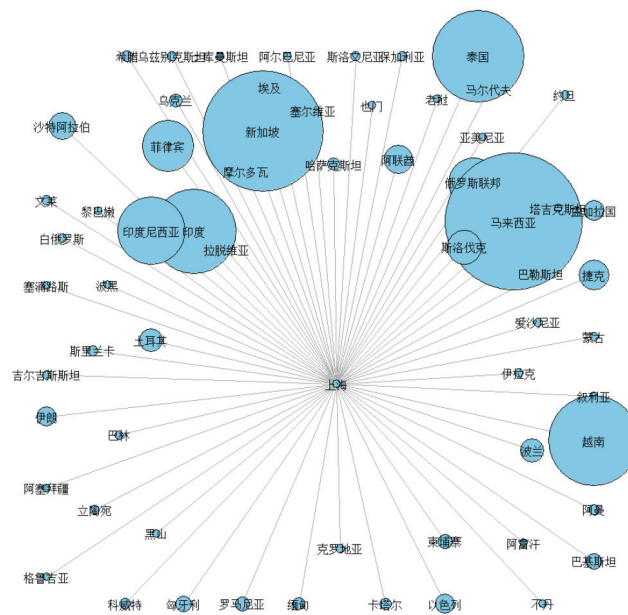
《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报告 2018》对 2013 年到 2017 年间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成果进行了量化绩效评估，用数据勾勒出上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与共建国的贸易往来和经济投资上取得的成就。本报告将在《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报告 2018》基础上加入新一年数据 (2018)，并首次采用区域比较方式，进一步明确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定位、进展与不足。

(一) 贸易绩效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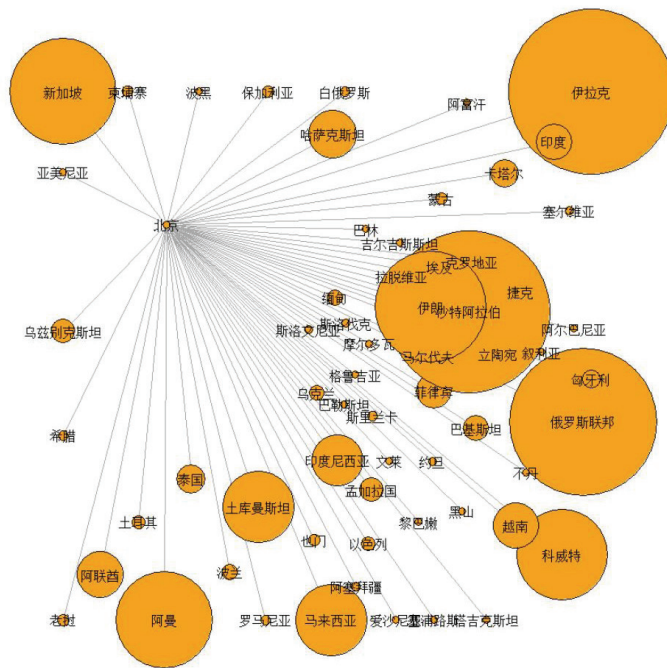
2017 年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单位亿美元)



2018 年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单位亿美元)



2018 年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单位亿美元)



2018 年广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单位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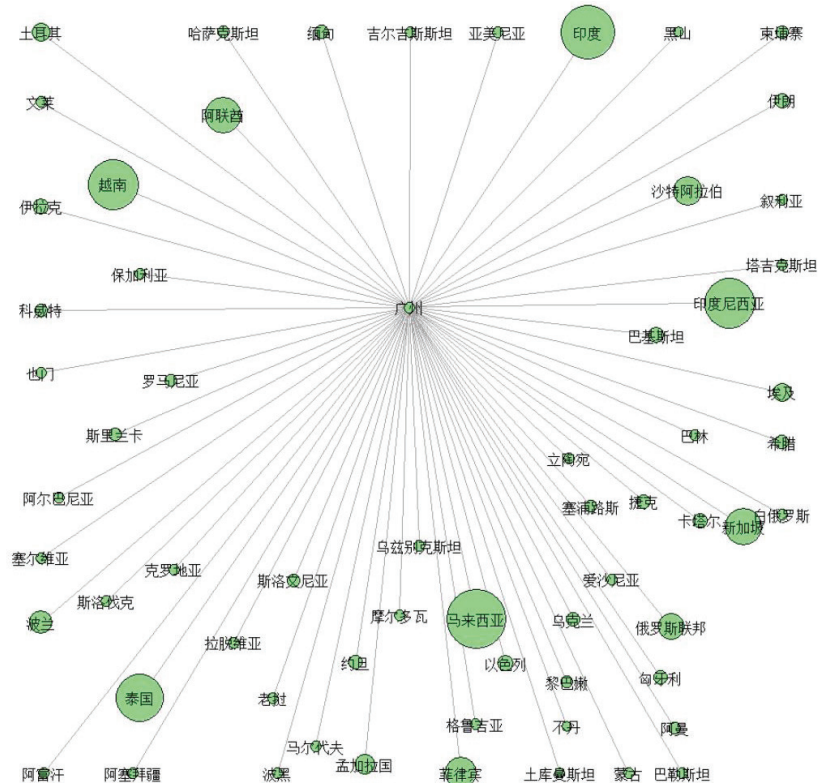


图 1: 上海, 北京和广州与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图 (2017 年与 2018 年)
资料来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库 V2.0”。

根据数据分析，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基本延续之前几年的发展态势，呈现出明显侧重周边且重点突出的特征。东南亚依然是上海最主要的贸易往来地区，但其内部的主要贸易伙伴出现了一定分化；以印度为代表新兴大国是东南亚地区之外上海最主要的贸易对象，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而以俄罗斯和中东欧为代表的欧洲地区，成为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往来的新增长点，与部分国家的贸易额过去一年内出现了井喷式增长。

1、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贸易格局

首先，东南亚依然是上海最主要的贸易往来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依然是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最主要的外贸伙伴。2017年，上海与新加坡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63.27亿美元、马来西亚150.51亿美元、泰国102.63亿美元、印度尼西亚67.9亿美元，越南92.53亿美元。2018年，上述国家依然是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位居前五位的贸易伙伴，但内部出现了一定分化。与2017年相比，上海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额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从2017年的163亿美元回落至2018年的137.57亿美元。相比之下，上海与其他数个东南亚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均有一定上升，马来西亚同比增长了4%，达到157.23亿美元，一举超越新加坡成为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首要贸易伙伴。印度尼西亚、越南与上海的贸易往来也有进一步提升，分别达到72.57亿美元和100.74亿美元。

其次，除东南亚国家外，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新兴经济体依然是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贸易伙伴。2017年，印度是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五大贸易伙伴；2018年，印度继续维持这一地位，但贸易数量同比增长了7%，达到93.33亿美元。

在新兴发展地区之外，拥有较好发展基础和较多优质商品的欧洲国家仍是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贸易伙伴，并在2018年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2017年，俄罗斯、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成为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贸易伙伴，其地位仅次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位于第三阵营。2018年，该地区国家在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贸易中的作用日益壮大，其中斯洛伐克与上海在2018年的贸易额增长迅猛，从2017年的6.15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31.92亿美元，同比增长达400%。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斯洛伐克公司AeroMobil生产的飞行汽车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产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与斯洛伐克贸易发展的良好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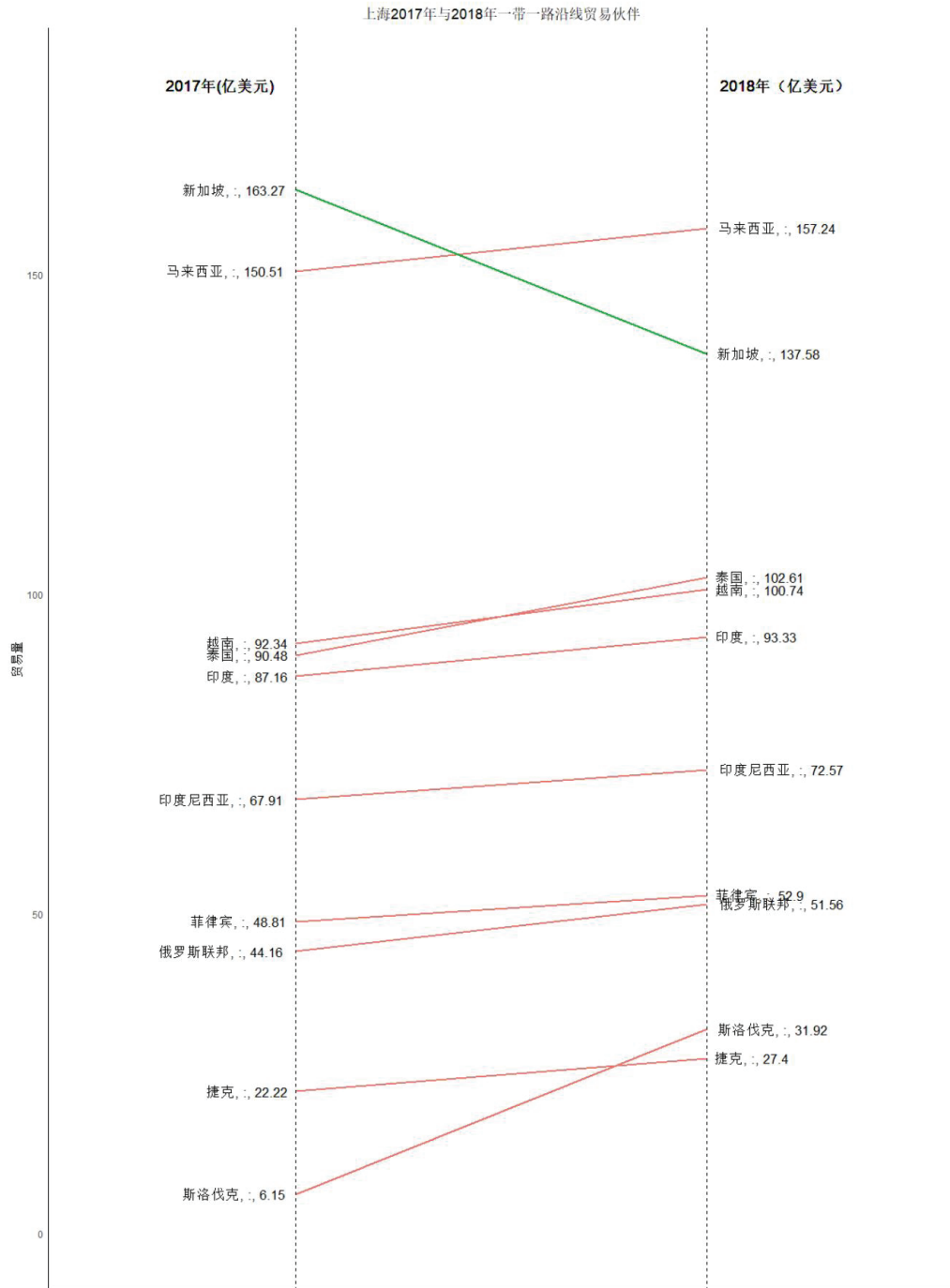


图 2: 2017-2018 年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贸易往来图
资料来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数据库 V2.0”。

在今年的报告中, 除分析上海自身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数据外, 还将分析北京与广州两个城市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数据。根据北京海关和广州海关的相关统计, 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贸易结构与上海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而广州则由于与上海同为沿海地区, 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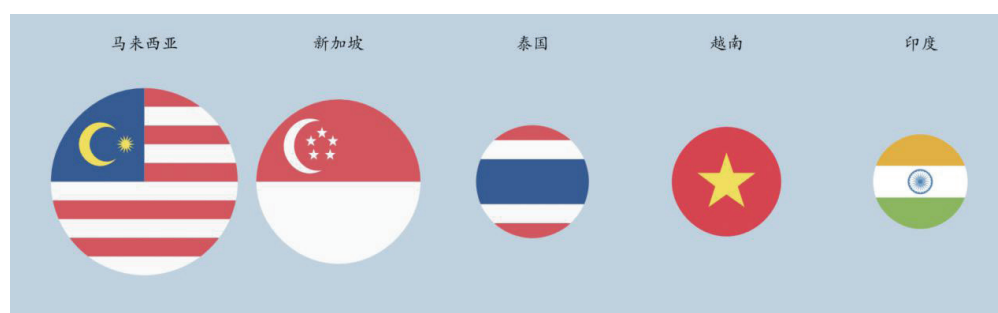
结构与上海尽管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同质性相对较高。

根据北京海关统计，北京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以西亚国家为主，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以资源和初级产品为主导的特征。2018年，北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前五位贸易伙伴中，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占据其中三位。进一步而言，北京与伊拉克贸易额高达199亿美元，与沙特阿拉伯高达195亿美元，与伊朗则达到131亿美元。除西亚国家外，俄罗斯和新加坡也是北京重要的贸易伙伴。2018年，北京与俄罗斯贸易往来总金额高达176亿美元，其中进口160亿美元，出口16亿美元。北京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额也达到125亿美元的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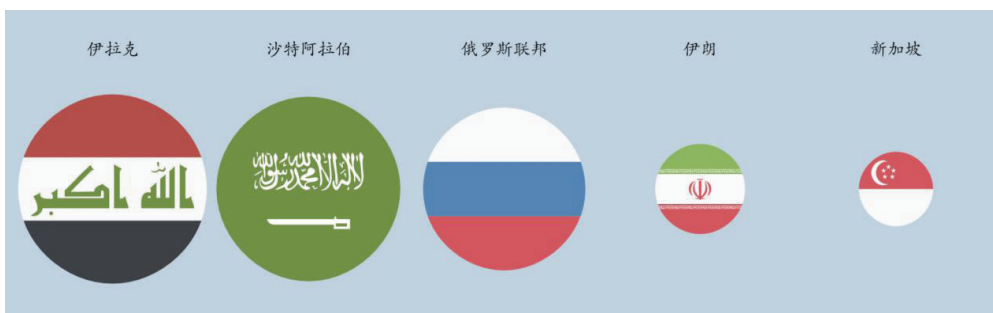
广州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贸易往来的绝对数额，与北京和上海存在一定差距，这主要是由于本研究采用的国别统计数据中，广东地区的海关数据仅纳入广州海关的数据，而其他如深圳和汕头海关的数据，却并未纳入其中，因此，广州海关的贸易数据可能仅仅包含了广州的贸易数据，而没有涵盖整个广东省。但从广州的贸易结构来看，已呈现出明显的沿海特征。首先，广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前五位的伙伴均为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这一点与上海基本相同。广州排名首位的“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伙伴也是马来西亚，与广州有43.41亿美元的贸易往来，排名第二位是印度，与广州有38.62亿美元的贸易往来，广州的其他贸易伙伴包括印度尼西亚(35.90亿美元)、越南(35.41亿美元)、泰国(33.12亿美元)和新加坡(23.81亿美元)。

与上海和北京相比，广州另一个特色是其贸易伙伴的均衡化，在本报告提出的数据可视化中，上海与北京的贸易网络中都存在数个规模巨大的关键节点。例如，在上海的贸易网络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占据了重要的节点地位，而在北京的贸易网络中，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也是其在“一带一路”沿线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是，在广州的贸易网络图中，贸易伙伴的节点大小差距不大，并没有类似北京和上海那样的贸易节点。这也表明，广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虽然规模一般，但相对较为均衡。

2018年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前五大贸易伙伴



2018 年北京在“一带一路”沿线前五大贸易伙伴



2018 年广州在“一带一路”沿线前五大贸易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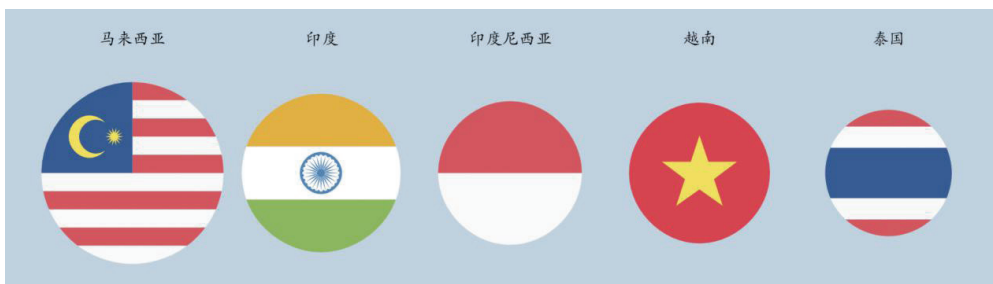


图 3: 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主要“一带一路”贸易伙伴示意图

2.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贸易均衡情况

当前，全球化发展已经进入了调整和转型的关键阶段，贸易逆差与顺差不仅关系到贸易平衡问题，更与相关国家国内的政治经济矛盾相互交织，进而对总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去年的报告专门讨论了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中的均衡问题，并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自 2013 年以来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的顺差与逆差情况。相比于过去几年的发展，2018 年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顺差与逆差情况呈现出了相对积极的变化，朝着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在过去数年内，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除东南亚之外，都存在较为明显的顺差，也即上海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金额通常高于其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商品金额，但是在 2018 年，这一形势出现了变化。一方面，在东南亚地区，上海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往来近年来均保持逆差势头，但是上海在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今年均有所降低，除南亚之外，上海与欧洲、西亚和中亚地区国家基本都保持贸易平衡的状态。这一方面说明，在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深刻调整的当下，上海本身的出口有所降低；同时，这另一方面也表明，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质产品开始逐步进入上海市场，进口扩大效应逐步体现，这使得“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在上海继续深入发展，落地开花。

除上海之外，北京和广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平衡情况也都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呈现出了明显的逆差特征，这主要与其侧重于能源和初级产品的贸易结构有关。根据目前掌握的数据，北京与东南亚和南亚的贸易总体处于较为平衡和适度顺差的阶段，但其与欧洲、西亚和中亚地区国家的贸易却呈现出了明显逆差（欧洲地区：174.59 亿美元；中亚地区 126.73 亿美元；西亚地区：762.26 亿美元）。将这一分析结果与此前北京主要贸易伙伴的情况进行结合，可以进一步确定，能源进口是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北京和上海相比，广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则呈现出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在今年报告所比较的三个城市中，广州是唯一实现了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所有主要区域（东亚、南亚、欧洲、西亚、中亚）全部顺差的城市，这也是其产业结构以出口性企业为导向的结果。结合此前的分析，广州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伙伴呈现出较为均衡的分布方式，这也进一步说明广州的出口产业具有较广的地域覆盖性，其生产的产品可出口到“一带一路”各区域市场，市场渗透力较强。



图 3：上海、北京、广州三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均衡图（2018 年）

3、与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情况比较

在去年的数据分析中，研究发现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在上海对外贸易结构中的重要性逐步增加，但上海的主要贸易伙伴依然是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欧美

发达国家。此对比有助于对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商贸工作进行客观、理性的评估。今年的报告继承了这一分析模式，并将比较研究对象拓展至北京与广州。根据目前的研究，2018年上海的贸易往来中，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依然是上海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年来依然保持稳步追赶的态势。通过和北京与广州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上海的贸易结构具有一定独特性，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首先，2012年到2016年期间，上海与七国集团贸易额高达11520亿美元，是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近一倍。2018年，上海与七国集团的贸易额高达2059亿美元，而与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为961.27亿美元，仅为七国集团贸易额的46%。这说明，2018年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稳步上升，但与其与发达国家贸易往来差距依然保持稳定，发达国家依然是上海对外经贸的主要伙伴。

其次，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金额明显高于其与七国集团的贸易往来。2018年，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额高达1750亿美元，而与七国集团的贸易额则为约954亿美元，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额是其与七国集团贸易额的1.7倍。相比之下，广州与七国集团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数据基本持平。2018年，广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为342.6亿美元，而与其与七国集团的贸易额为500.83亿美元。其与七国集团的贸易额略高于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

北京、上海、广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七国集团的贸易关系



图4: 上海、北京、广州三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七国集团贸易关系对比 (2018年)

4、总结

根据以上分析和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贸易情况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贸易领域具有市场导向、重点突出，进出均衡、侧重高端等方面特点。

首先，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主导特点。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的贸易伙伴和相应贸易增长点主要均为市场调节的产物。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依然以满足相应工商业产品生产、制造和消费为主，侧重于直接满足生产、生活需求。这与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式呈现出显著差别，在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中，能源与初级产品是其重点。这虽然一方面与北京自身的需求有关，但更与响应国家部署和统筹协调有关。因此，北京在贸易领域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主要是为满足国家建设和发展所需的基础性需求。相比之下，上海在贸易领域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模式与广州相似度更高，两者基本都是以相应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直接产品有关，较少涉及大宗能源和初级产品贸易。

其次，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呈现出重点突出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国家依然是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最主要贸易伙伴，上海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也显著高于与其他地区国家的贸易。这表明，上海的主要贸易形式与长三角其他省市的沿海区域贸易保持一致，侧重与东南亚方面的来料加工出口贸易，自身特色尚需进一步挖掘。今年数据同时也表明，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虽然仍以东南亚地区为重点，但外延有所扩大，逐步从东南亚地区发展为印太地区，印度成为上海对外贸易的重要伙伴，这一方面体现了印度近年来经济增长对于国际贸易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在当前全球贸易结构转型和美国对印度发起贸易纠纷的背景下，印度自身贸易重点方向的调整，这一动向无疑需要进一步跟踪。

在区域比较的视角下，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也呈现出重点突出的模式，其主要贸易对象以西亚国家为主，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数额显著高于其他国家。但正如前文所言，北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重点是典型的能源贸易主导型贸易结构，因此不仅是区域集中，而且领域也十分集中。而上海的贸易虽然在区域国别上重点突出，但在领域上相对多元。而广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合作则呈现出多元分散的格局，并没有数个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重点贸易伙伴，当然，由于本研究的数据统计仅仅包含了广州的国别贸易往来数据，而广东省其他地市

的贸易往来并没有包含其中，因此这一分析结果还需要在未来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

第三，2018年，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往来呈现出更为均衡的情况。2018年，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呈现出较为均衡的局面，并且呈现出温和逆差。上海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进口的货物金额超过了其向沿线国家出口的金额。与上一年相比，2018年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的贸易均衡化不仅局限于与上海临近的东亚与东南亚地区，更逐步扩展到西亚、中亚和欧洲等地区。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日益深入和当前西方国家经贸结构的转型，上海市场正越来越接受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质商品，同时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日趋活跃。在区域比较的视角下，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展示出不同的发展模式，北京以能源贸易为主导，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均衡度呈现出严重的逆差情况。一方面北京大量进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和初级产品，另一方面又向这些区域出口大量商品。广州长期以来是中国出口加工产业的聚集地，是“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天然的出口伙伴，但限于本身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容量，目前其从“一带一路”沿线的进口贸易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格局呈现出了顺差形态。

第四，上海贸易发展的侧重点依然聚焦发达地区。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上海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依然显著高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并且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中，2018年与上海贸易往来增长最快的国家也是克罗地亚等相对较为发达的国家。这些数据都表明，上海作为中国大陆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本身市场定位相对较为高端，市民对于进口产品具有高品质需求，这虽对上海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产生了一定限制作用，但这也同时表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拥有较高品质但又暂时不为上海市场所熟悉的产品，将会成为上海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长的新亮点。伴随着进博会在上海的落地生根和常态化举办，“一带一路”国家的优质产品将获得更好的推介平台，向上海市场和上海市民推广。

（二） 投资绩 效评估

对外投资是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又一重要领域。在去年的报告中，根据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对外投资公司备案数据库和上海市商务委发布的上海对外投资报告，本研究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今年的报告拟在此基础上，将分析范围从上海扩展至全国，通过比较分析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投资情况，明确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全国的位置。数据分析表明，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领

域活跃程度、投资目的地数量和投资公司种类多样性等指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其自身特色还需进一步提升。

1、对外投资公司数量与活跃度

根据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司的相关数据，截止 2019 年 3 月，全国共有 3 万多家企业参与境外投资，本研究通过对其关键词进行提取和定位，整理出我国不同省份参与境外投资的投资数量，并根据其投资范围将其分为全球层面投资和“一带一路”层面投资两类。在这两类企业中，上海企业在数量上均位居前茅。在全球层面，上海参与境外投资的企业数量仅次于广东、江苏和浙江，排行第四，高于北京、山东等省市。而在“一带一路”层面，上海参与对外投资的企业数量也排名靠前，位居全国第五，仅次于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对以上两个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在全球层面境外投资企业数量上，排名前十的省份主要有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以及四川等内陆较发达省份。总之，上述地区多为沿海地区和发达地区。这表明不同省市对外经济投资活跃程度与自身发展水平呈现对应关系。发达地区通常资本密集度较高、经济外向性强，企业“走出去”需求旺盛。而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企业数量上，排名前十的省份主要分为两类。前五位与全球层面的投资排行基本一致，包括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和北京等。此类省市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较多的投资企业，而后四位则多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毗邻的省市与自治区，包括云南、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等。这类地区虽然自身经济发展程度在全国范围并不位居前列，但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也可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展跨境投资。

以上分析表明，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投资程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一方面，上海自身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本积累水平已使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对外投资的高起点，承载了国家众多重要的“走出去”项目。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上海也积极对自身对外投资结构进行转型，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进行相关项目投资。本研究总结的数据表明，不少在全球层面拥有较多境外投资企业的省市，其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项目并不多。这说明，虽然总体上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可带动对外投资水平，但这一拉动作用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一个省市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直接参与。因此，上海同时在两项排名中均名列前茅，这既体现了上海自身深厚的发展底蕴，同时也体现了上海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态度。本报告的数据分析也得到上海市商务委相关讨论的佐证，根据其报告，截

至 2018 年底，上海企业以上海自贸区为创新载体，积极发挥对内对外辐射作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了近 200 多个项目，中方投资额达 46.8 亿美元。²

以上数据分析也表明，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属于对外投资的第一集团，但其与领先地位尚有一定距离。在全球层面参与投资的上海企业共有 2859 家，而广东则有 5627 家，浙江有 3010 家，江苏有 3118 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共有 389 家上海企业参与投资，而排名第一位江苏有 676 家企业，浙江与广东也有超过 600 多家企业。虽然受相关数据的限制，本报告只可获得备案公司的数量，无法掌握相关投资金额，但即便是单纯的数量对比也表明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层面的对外投资与其他省市还存在一定差距，中央赋予的“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尚有一定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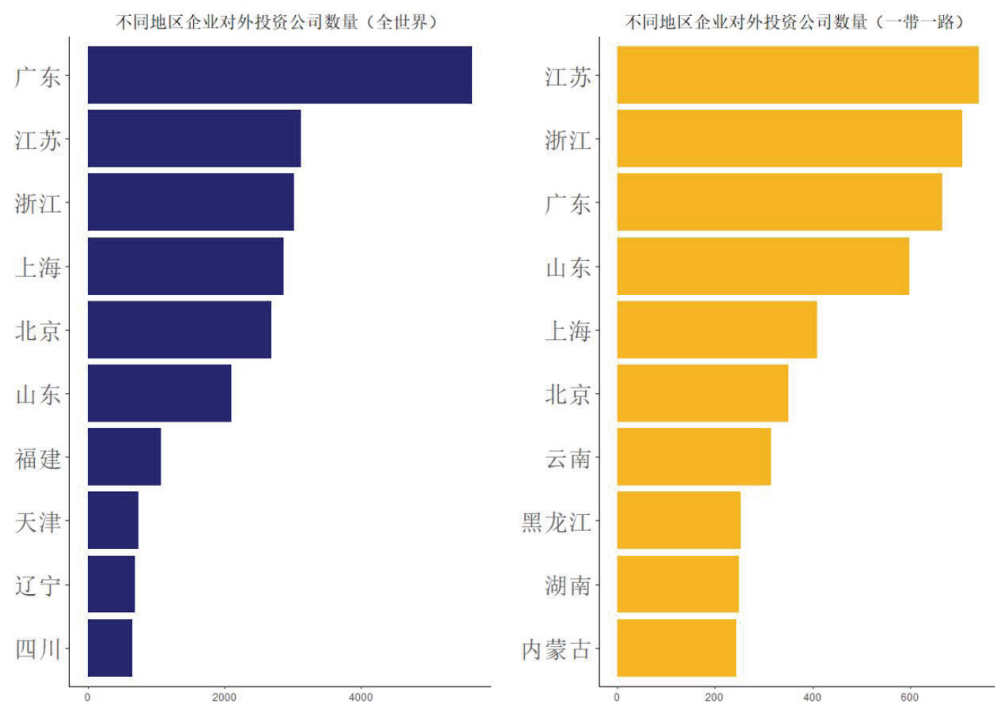


图 5: 全球投资前十省市和“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前十省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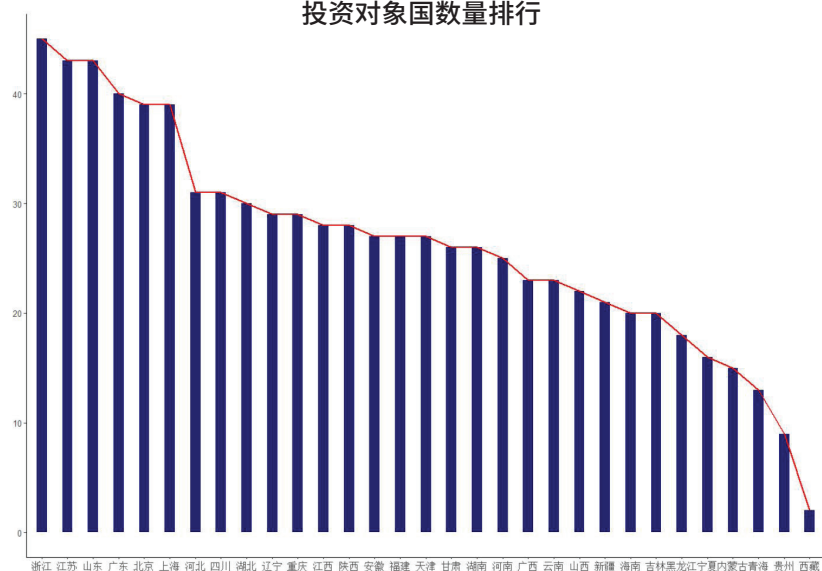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地理分布

去年报告系统回顾了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目的国的地理分布情况。在去年基础上，今年报告结合区域比较的视角，通过与国内其他省区市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目的地进行比较，可更全面地展示上海投资地点选择的特点。

² 上海市商务委：“上海市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现状概览”，《上海对外投资合作（2019）年度发展报告》，http://www.sohu.com/a/319717956_284463。

就投资国数量而言，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项目范围覆盖广，总共覆盖 38 个国家，占整个“一带一路”国家的 58%，在全国排名第五。浙江、山东、江苏、广东四省在覆盖国家数量超越上海，其中浙江、山东、江苏三省覆盖国家超过 40 国（浙江：44、山东：42、江苏：42），覆盖近 70% 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此数据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与其它省份相比，其投资覆盖依然存在差距，企业主动谋划参与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有待提高。以江苏为例，近年来，江苏不仅鼓励企业“走出去”，更鼓励企业通过在外建设工业园区等方式搭建平台，吸引更多企业入驻，形成集聚效应。江苏省民营企业红豆集团就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一带专门建立西哈努克工业园，吸引大量企业投资，带动当地就业，成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典范。

投资对象国数量排行



除国家数量之外，投资国别的选择也是评估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维度。上海投资的地理范围跨度大，在“一带一路”范畴内，北至俄罗斯，西至捷克，南至印度尼西亚都有上海公司投资的项目。在上海目前的投资中，东南亚和南亚依然是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据本研究数据统计，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共有 277 家参与对外投资的上海企业，占总体备案上海企业的 75%。这一结果与上海对外贸易格局基本重叠，说明上海企业对外投资首要侧重的是其邻近和国际产业链分布的节点地区。东南亚国家属于中国的海上邻国，与上海地理区位接近，语言、文化和风俗也有一定相似性，这些国家在当前世界贸易的产业链布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是国际投资和贸易的重要节点。而南亚地区的印度近年来积极对内推动改革，对外塑造大国地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的驱动力量，从而带动南亚成为上海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总之，

以上数据表明上海企业对外投资具有侧重毗邻方便性、紧跟国际产业链走向和侧重新兴发展中国家等特点。

从区域比较的角度出发，上海对外投资目的国的选择基本与其他主要发达地区城市属同一范畴。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最多的十个省市中，上海的投资目的国分布与浙江、江苏、广州和北京属于同一类。以在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投资的企业占全部“一带一路”沿线境外投资企业的比例为指标进行分析，我国大部分省市都将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设为其投资重点。例如，江苏在东南亚的投资企业数量占其总对外投资企业的78%，浙江为72%，广东为77%，山东为68%。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各主要发达省市在“一带一路”投资国家目的地选择上都具有相似考虑。当前，我国发达地区主要集中于沿海省份，其经济结构和投资取向有所类似，较多依赖制造、加工和出口等产业，因此其在选择对外投资目的地时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而反观以跨境贸易为主要参与形式的数个边境省份，其主要投资的“一带一路”国家基本都是与其有直接边境接壤的邻国。例如，黑龙江的对外投资中就有88%的企业项目是在俄罗斯，而新疆的对外投资中有78%的企业的投资对象国是中亚国家，而内蒙古的对外投资企业中有89%的企业将投资目的国设定为俄罗斯和蒙古。

与其他省区市相比，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国分布重点更为突出，多元性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相对不足。根据一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前三大投资国中的公司数量在其整体对外投资数量中的比例，本研究计算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我国相关省份的投资国别集中度。根据目前的统计，上海的比例为41%，即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前三大投资目的国（新加坡、越南、印度）中的投资公司数量占其总体对外投资公司数量的41%，而我国其他省区市的这一指标普遍比上海低，例如北京为35%，广东为39%，江苏为33%。浙江为36%，山东为28%。而在一部分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边陲省份，此指标比例则明显偏高，例如新疆占比为65%，黑龙江占比为92%，云南占比为73%。这表明投资对象国多元性和平衡性是反应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参照。在具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多样化产业结构的省区市，公司和产业通常具有更高的商业定位和更开阔的市场发展视野，因此可以选择更多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而经济产业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其生产发展资料相对单一，多以边境和跨境投资为主，其投资的地区明显单一，也更为集中。根据此指标进行统计，可发现上海的“一带一路”投资基本符合我国发达省市的一般特征，即相对较为多元，投资公司地理分布较高，但上海与其他一线省区市相比，这一指标相对较高，说明上海的“一带一路”投资的分布多元性有所不足，主要都集中在数个关键国家上。上海目前境外

投资虽在范围上已经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但在不同国家的投入还应有所平衡和增加，从而实现投资进一步多元化。



图 6: 上海、北京、广州、江苏、浙江、新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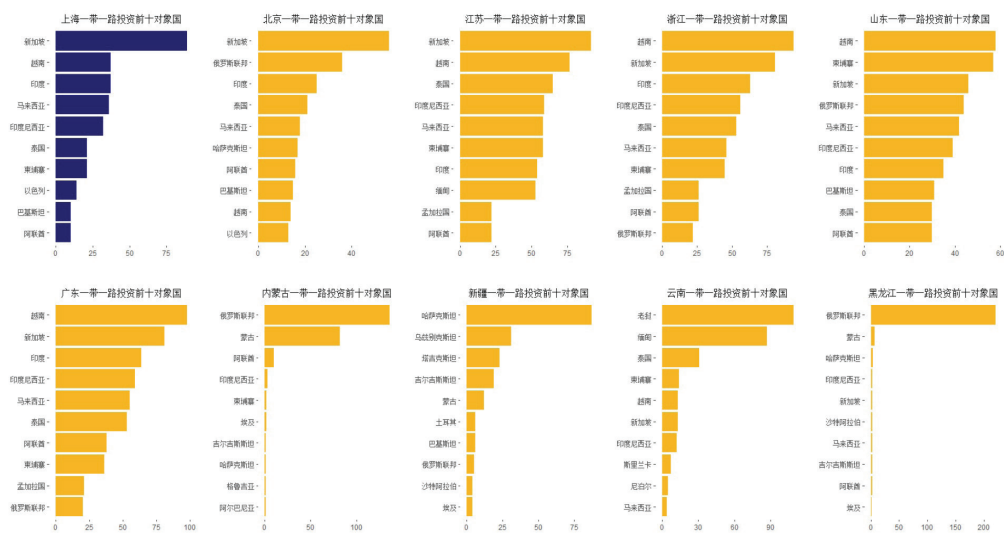


图 7: 上海、北京、广州、江苏、浙江、新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上海对外投资合作（2019）年度发展报告

3、投资类别分布

除对外投资数量和地理分布外，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也是决定上海对外投资质量的重要因素。2018年，上海对外投资结构总体上进一步优化发展。根据市商委2018年的最新数据，最近一年中上海总体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比2017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变化，2018年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和信息制造业是上海企业对

外投资的前三大支柱产业。其中，租赁及商务服务业的投资额为 383,591 万美元，占 2018 年总投资额的 22.74%，同比增长 103.41%；制造业投资额为 305,087 万美元，占 2018 年总投资额的 18.08%，同比增 17.38%；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额为 212,886 万美元，占 2018 年总投资额的 12.62%，同比涨幅达 81.12%。³同时，过去几年中占较高比例的房地产和文娱产业的投资进一步降低。

以上这些数据结构可以看出，上海的对外投资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传统优势产业继续领跑对外投资。上海作为中国大陆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化工业的发源地，商业服务和制造业是上海的传统优势。近年来，上海在“四大品牌”建设的推动下，“上海制造”和“上海服务”在过去基础上进一步腾笼换鸟，改造升级。这些传统优势成为上海对外投资的主要支撑，在海外市场获得较好发展。其次，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正成为上海对外经贸投资新增长点。2018 年，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成为了上海对外投资的第三大产业。近年来，上海主动布局高端制造产业，以建设国际科创中心为契机积极对接新科技发展潮流，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产业。这些布局都推动科技产业成为上海对外发展的新动力。

本皮书首本报告（2018）对上海对外投资公司名称进行了文本分析，创新性地分析了上海参与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弥补了目前公开数据中缺乏直接讨论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布局产业结构的特点的局限。今年的报告将继承此研究路径，并加入区域比较的视角，通过分析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与全国省区市公司名称中关键词的变化，侧面展示上海投资与全国其他省区市投资的相似度和不同特点。

首先，从全局角度看，通过比较上海与全国其他省区市涉“一带一路”投资公司的名称。⁴，可发现与上海公司具有较高相似度的公司名称的省份多集中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江苏、广东、北京、浙江和山东是与上海在公司名称关键词上相似度最高的五个地区。与上海地理区位较远或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省份，其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公司名称关键词与上海公司的相似度也随之减弱。这表明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投资在国内属于领先的第一集团，并与多个东部沿海和重点城市的对外投资格局保持一致。

其次，本研究还分别选取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等五个发达省市的相关

3 上海市商务委：“上海市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现状概览”，《上海对外投资合作（2019）年度发展报告》，http://www.sohu.com/a/319717956_284463。

4 相似度比较时去除了公司名称中地理称谓和无解释意义的名词。

公司名称，提取数量最多的十个关键词。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研究，可发现上海与国内其他发达省市类似，“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都侧重技术传播、贸易推广等方面。首先，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科技优势是推动各省区市向“一带一路”投资的首要因素。在统计的五省市企业中，排名第一的关键词都是“科技”（上海：41，北京：72，广东：69，江苏：64，浙江：40）。而在前十位的关键词中，大部分关键词都与技术等有关，例如在上海和北京公司的关键词中，分别有13个和10个公司名称中包含着信息技术，在广东的投资中，有18家公司在名称中包含电子，浙江企业中有16家公司在名称中包含电器。这些都表明在“一带一路”沿线，上海与全国其他发达省市一样，都希望通过投资来向这些地区推广自身先进技术和产品，扩展自身优质产品的海外市场。

第二，侧重服务业也是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对外投资的重要特点。上海统计的公司名称关键词中，有15家企业名称中包含管理，而广东则有17家，北京有19家，浙江和江苏则没有。这说明在北、上、广等国内一线城市，除具备制造业优势外，其长期积淀形成的管理和服务模式也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占据优势，因此也是其对外投资的重要抓手。

第三，仅从公司名称中就可推断，单纯促进国际贸易并非上海对外投资主要的工作范畴。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投资公司中，没有一家公司名称中包含“贸易”等关键词，而反观其他省份，浙江有58家境外投资企业的名称中包含了“进出口”与“贸易”，广东有20家企业中的名称中包含“贸易”，江苏有58家企业的名称包含“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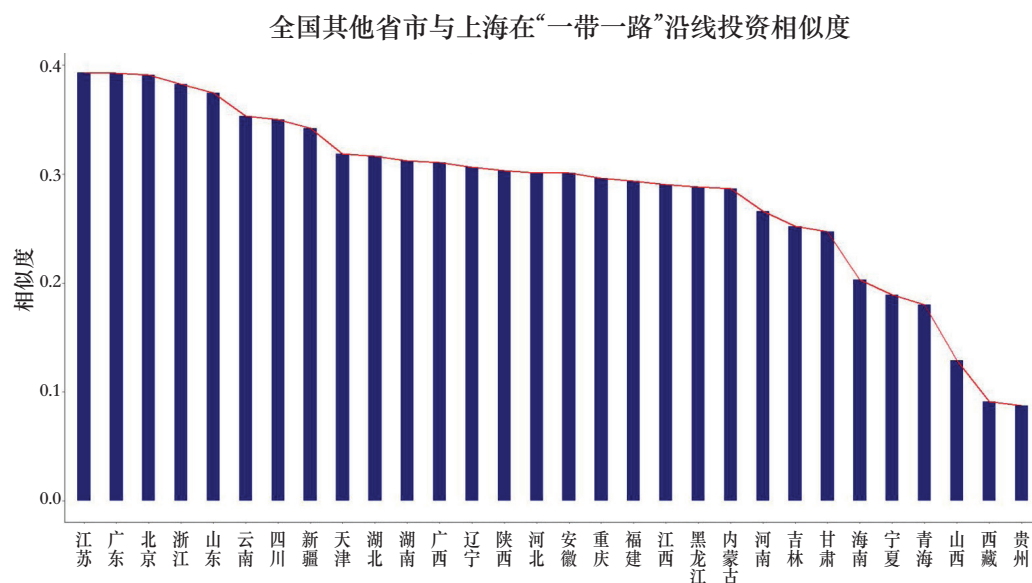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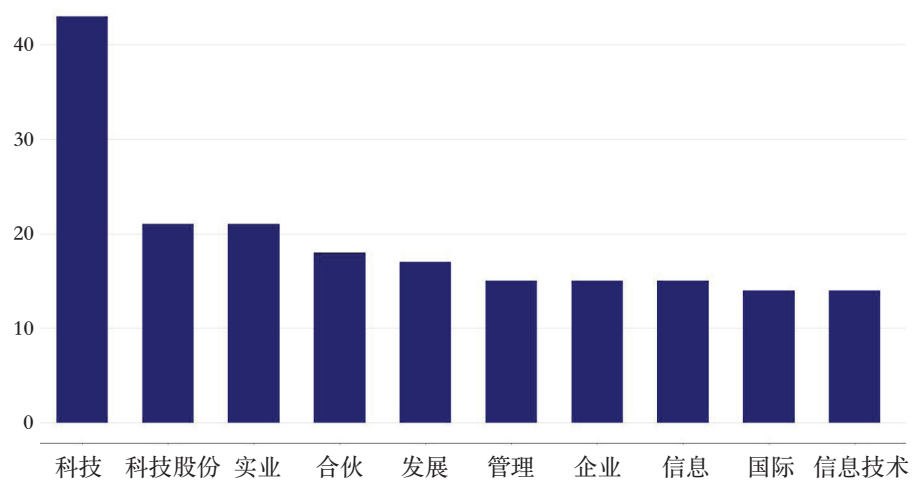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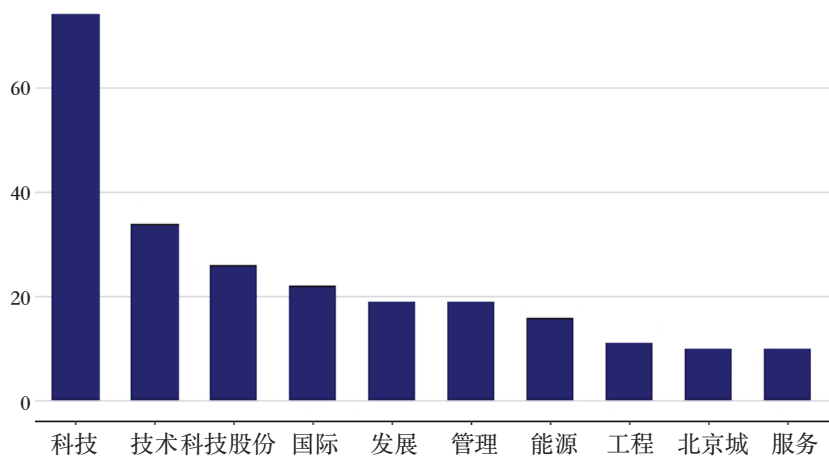


图 7：国内省区市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公司名称对比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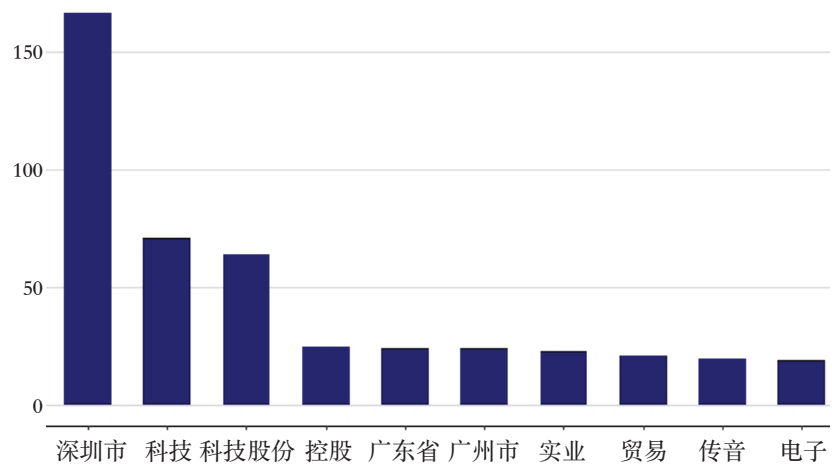
上海地区“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企业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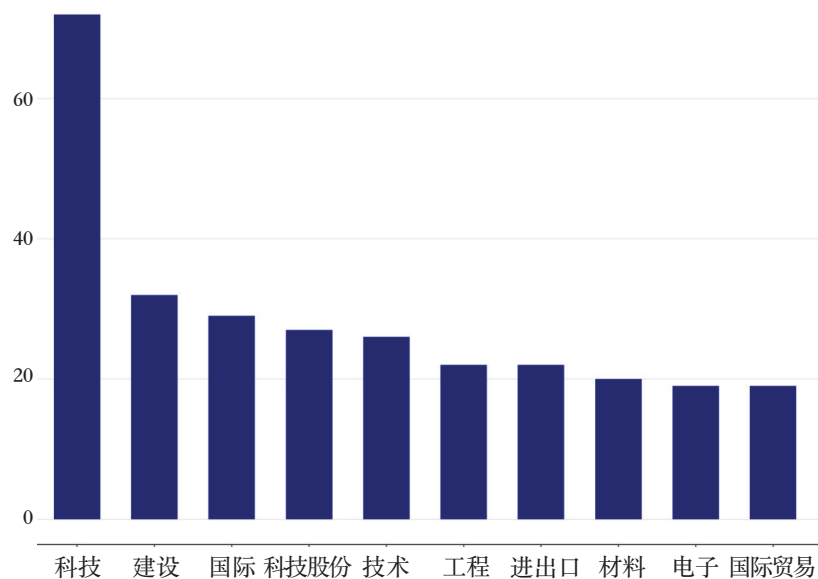
北京地区“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企业关键词



广东地区“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企业关键词



江苏地区“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企业关键词



浙江地区“一带一路”对外投资企业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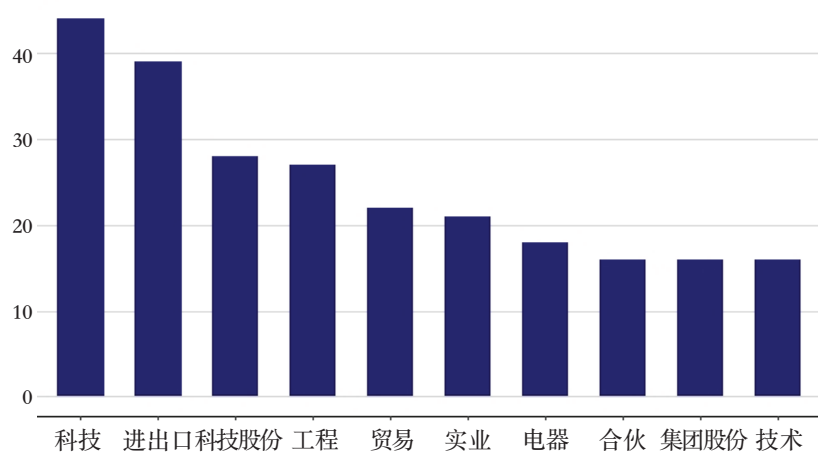


图 8: 国内不同省市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公司名称比较分析

4、总结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可发现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情况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稳居第一集团,但相比上海自身的发展定位和中央对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定位和相关要求,上海在升级和扩大“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方面还有所不足。

首先,上海投资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上位于全国领先地位。根据本报告选取的各项测算指标,上海投资无论其数量、覆盖范围还是金额,都在全国位居前列,充分体现了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主动承担“一带一路”建设使命,积极参与投资的责任意识。上海也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断将其与自身发展相结合,

将自身发展优势和品牌建设融入其中。从投资类别和投资公司的名称，可看出上海并没有如其他省份那样，走上一条简单的进出口加工贸易投资的道路，而是不断追寻产业链高端地位，以上海自身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等领域的优势主动占据他国市场的关键节点，建立相关产业链。上海积极通过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倒逼自身企业“走出去”，在复杂的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在优胜劣汰中锻造企业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从上海自贸区在金融上支持上海电气主动并购与装备 EPC 项目到上海航运中心地位促进中远海运海外发展，再到上海建工以“上海制造”的高品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上海企业正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树立鲜明的“上海特色”与“上海标准”，因此也必将从根本上提升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形象，并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其次，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还存在公司数量不足、国家分布不均匀、同质化竞争等问题。从公司数量上，虽然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但与广东、浙江等省份之间还存在数量上的差距。这主要是由于上海自身定位和层级相对较为高端，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发展和成熟程度相对较为低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海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然而，伴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和上海企业未来生存与升级的需求，两者之间的契合度将进一步提升，这将为上海拓展在“一带一路”沿线扩大投资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上海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分布还不够均衡。与其他省市相比，上海投资前三位的国家均为东南亚国家，这说明未来上海除要进一步深耕东南亚的既有投入之外，还应努力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地区的经济投资。此外，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也存在过度同质化的问题，这也说明上海需要利用自身优势，开发具有自身特色的投资项目，逐步打造自身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品牌。



上海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影响 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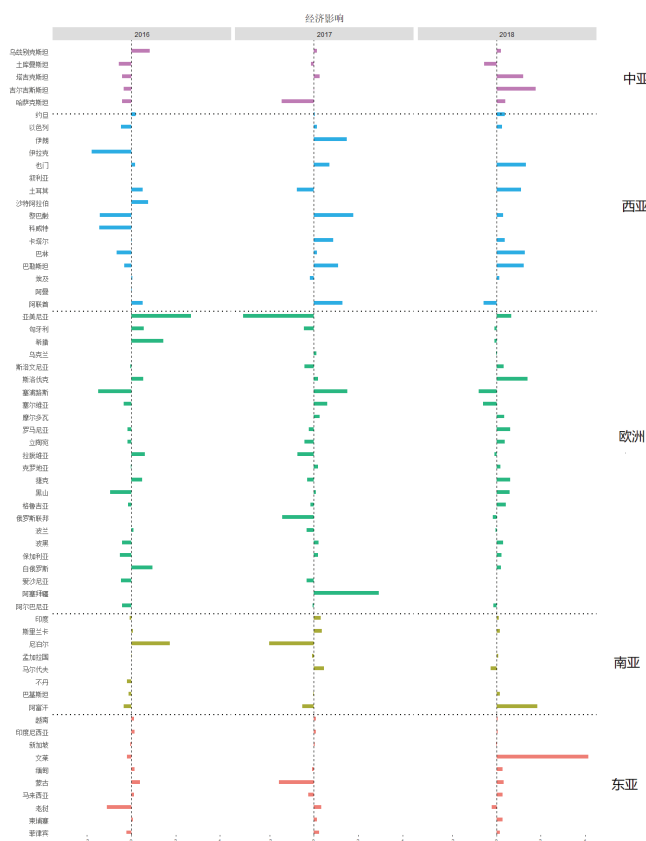
本皮书首本报告（2018）除对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情况进行简单描述外，还创新性地采取了影响分析的方式，讨论上海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应发展之间的关系。今年的报告以去年工作为基础，根据 2018 年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贸往来的数据，分析过去一年中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发展的影响。与去年一样，影响分析共分为五个维度，分别是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型、廉洁维度、社会稳定维度和公平维度。

1、五大维度影响同比较：共变效应模型

首先，本报告通过去年提出的计算公式，直接计算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型、廉洁程度、社会稳定程度、公正程度的共变效应。通过对其进行方向性的比较，来确定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入与相关国家发展的之间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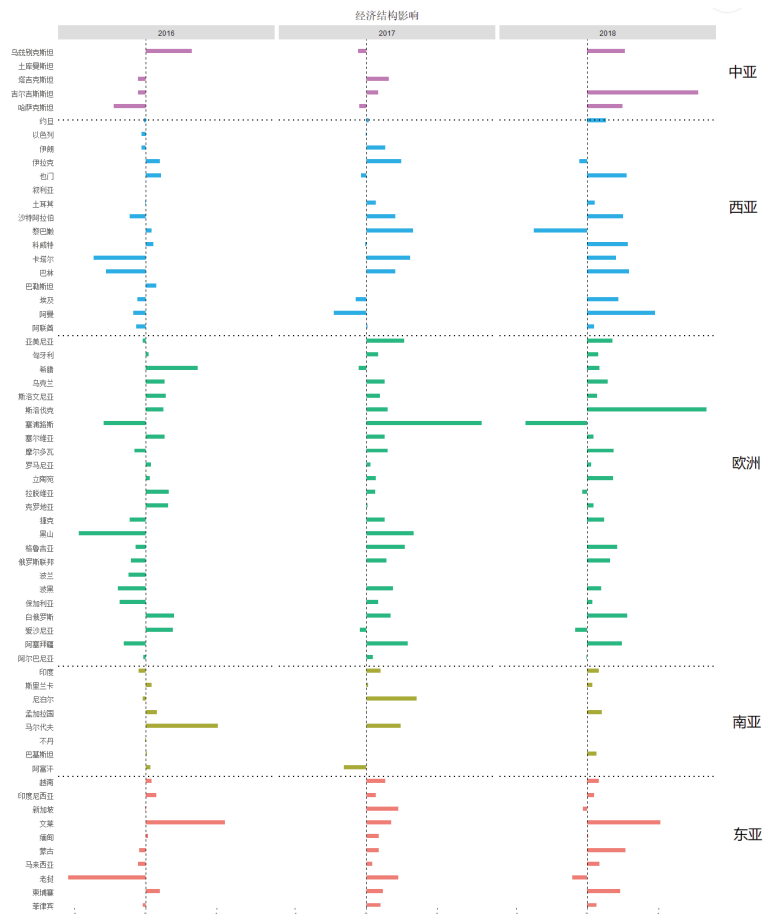
(1) 经济增长维度

经济增长是一国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实现各项社会进步的基础。根据本研究专门设计的相关计算公式，本研究计算了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报告发现，在过去一年内，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发紧密并逐步增强。根据本研究三年同比统计，在2016年期间，不少与上海有商贸往来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该指标上呈现出负向关系。这说明当年由于各种内外部不利因素影响，上海与许多“一带一路”国家的商贸往来，并未予以其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呈现同步变化的趋势。但在2018年，根据本研究所设计的指标，绝大多数与上海有就经贸往来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在这指标上实现了正面的关系。这表明在统计的三年来，上海服务“一带一路”的各项工作都与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提升起到了正面积积极的作用，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利于大部分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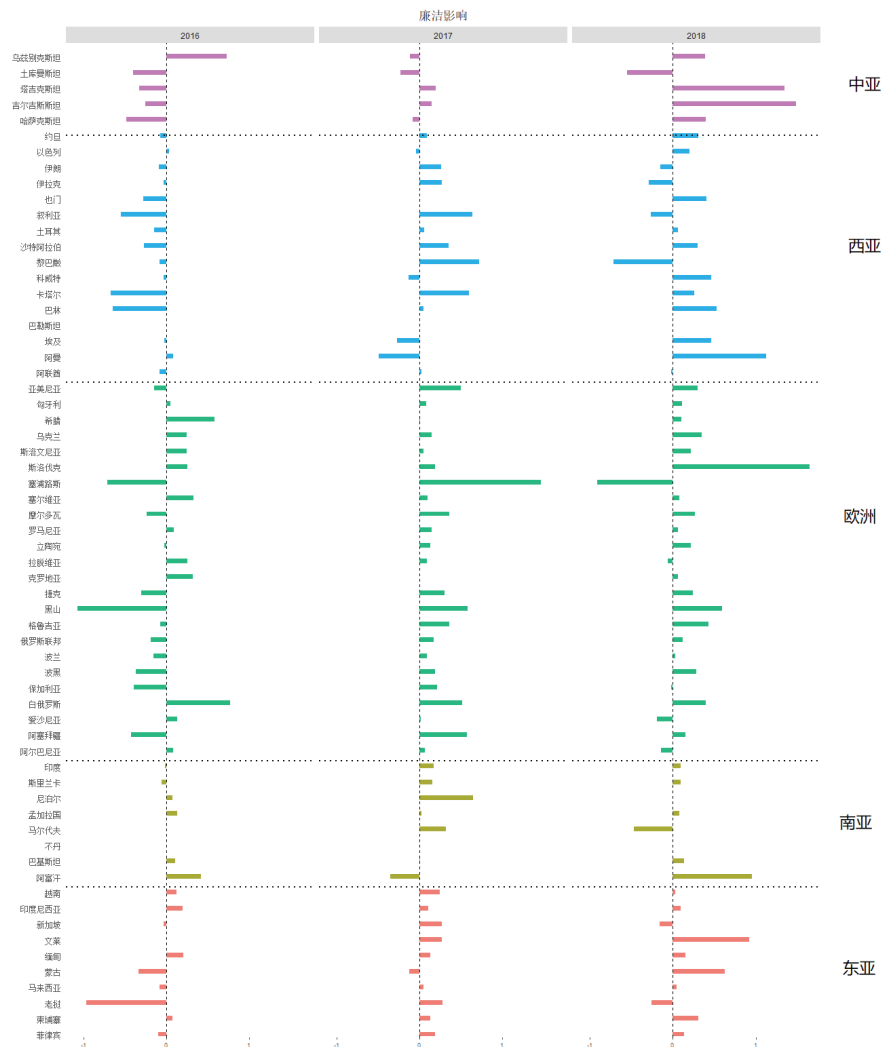
(2) 经济结构转型维度

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形势发展也呈现出了与经济发展类似的状况，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局面。2016年，近半数与上海有商贸往来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为负值，这说明在当年有不少“一带一路”国家虽与上海有商贸往来，但并未直接对该国工业化程度的提升产生直接的影响。2018年，此指标表明与上海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呈现为正面关系。这说明在去年，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实现工业化呈现出正面联系。此指标的提高从一个侧面反映上海当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质量和效益的总体提高，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由于沿线国家普遍基础设施存量较差，相应产业布局不完善，因此，上海与沿线国家的商贸合作更多集中于一些补短板与强基础的方面，侧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初期培育工作。这都导致了早期上海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并不能完全立刻在所有国家都转化为其经济结构的更新换代，但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和上海服务程度的加深，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市场成熟度在近年来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夯实与巩固，在此基础上，上海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将更加好地转化为其经济工业基础的提升，进而带动其总体社会进步与发展。



(3) 廉洁程度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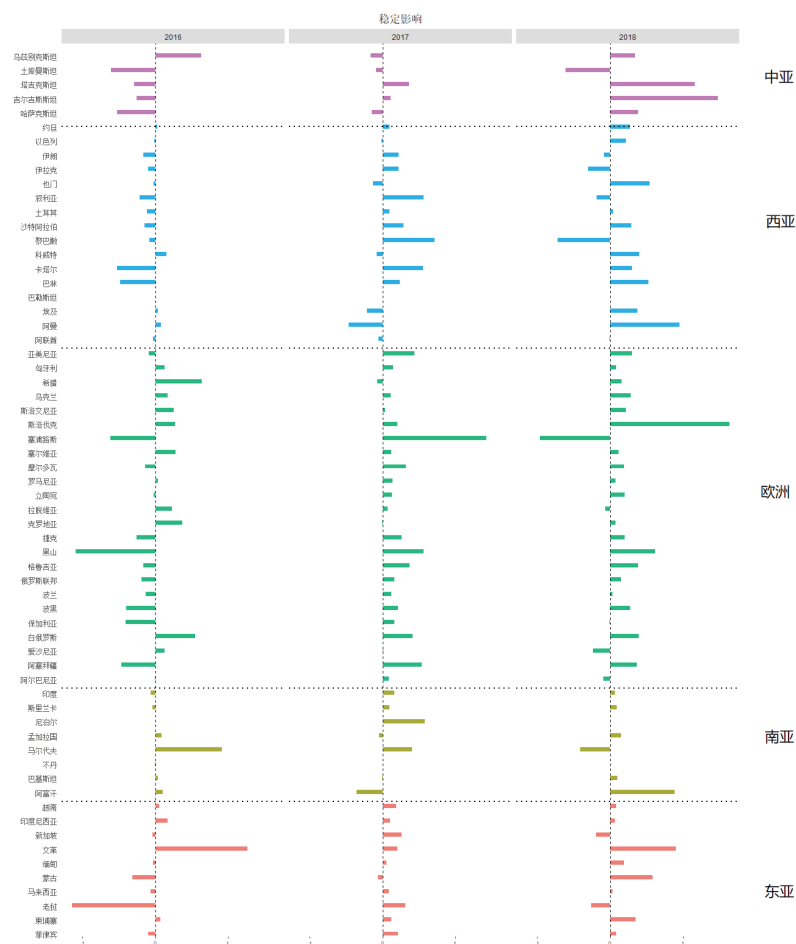
作为一项经济倡议，“一带一路”可以带来显著的经济影响，但其导致的社会影响也是本报告讨论的重点。通过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应投入和相应国家透明国际廉政指数的变化，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沿线国家廉政指数的变化基本保持了稳步变化的节奏，通过比较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三年的数据，可发现2016到2017年之间，廉洁影响程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积极变化。2016年，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廉洁情况改善出现了负面关系，这些国家多集中在中东欧地区。这说明在当时，上海与这些国家的商贸互动与其国内政策清廉情况变化出现脱节。此现象的出现，既是因为中东欧国家自身特色国情所导致的结果，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复杂性的体现。由于自身发展原因，许多“一带一路”国家存在相当程度的官僚主义、行政不作为和基层政府治理腐败的现象。在此类制度环境下开展经贸合作，必须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保持相关经贸合作的合规性。如若单纯为了利益而不顾法规和监管需求，就可能出现投资越多而腐败越重的恶性循环。考虑到上海自身的发展特点，上海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合作通常都会将合规性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海相关政府部门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充分重视法律合规培训，市商务委、贸促会也多次举办企业海外经营合规培训的专题培训班，在培养上海跨国经营人才的系统培训体系中加入了合规课程，位于上海的企业近年来也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建立企业内部监督机制，专注监控境外经贸活动中的腐败情况。例如，2019年9月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就专门发布消息，总部坐落于上海的中远集团就专门派出其纪检监察组组长刘鸿炜，赴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中远海运阿布扎比码头等单位进行专项监督工作。上海的这些做法取得了良好成效，这在本报告的数据分析中也得到了体现。除2016年外，2017年和2018年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都与沿线国家的清廉情况改善保持了同步，这虽然只是一个间接的指标，但充分反映了上海近年来对“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高标准要求，正在逐步产生良好结果和正向反馈。



(4) 稳定影响维度

“一带一路”沿线包含了数个国际政治热点地区，同时存在多个冲突频发、管制能力较弱、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在西方语境下常被称为“脆弱国家”。对于此类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发展带动安全的新安全观，力求为这些国家的去乱求治进程提供中国方案。为此，去年的报告专门探索了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国内安全稳定之间的联系，通过数据分析评估我国提出的发展安全观在沿线地区的落实情况。在今年报告中，本数据统计发现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投入与沿线国家的安全稳定形势存在非线性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从既有三年的数据可看出，在“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上海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往来都与该国安全形势的改善呈现出正面影响。不过在本报告统计的三年中，平均每年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沿线国家在安全维度上未与上海的服务呈现正面关系。这些国家大多集中于西亚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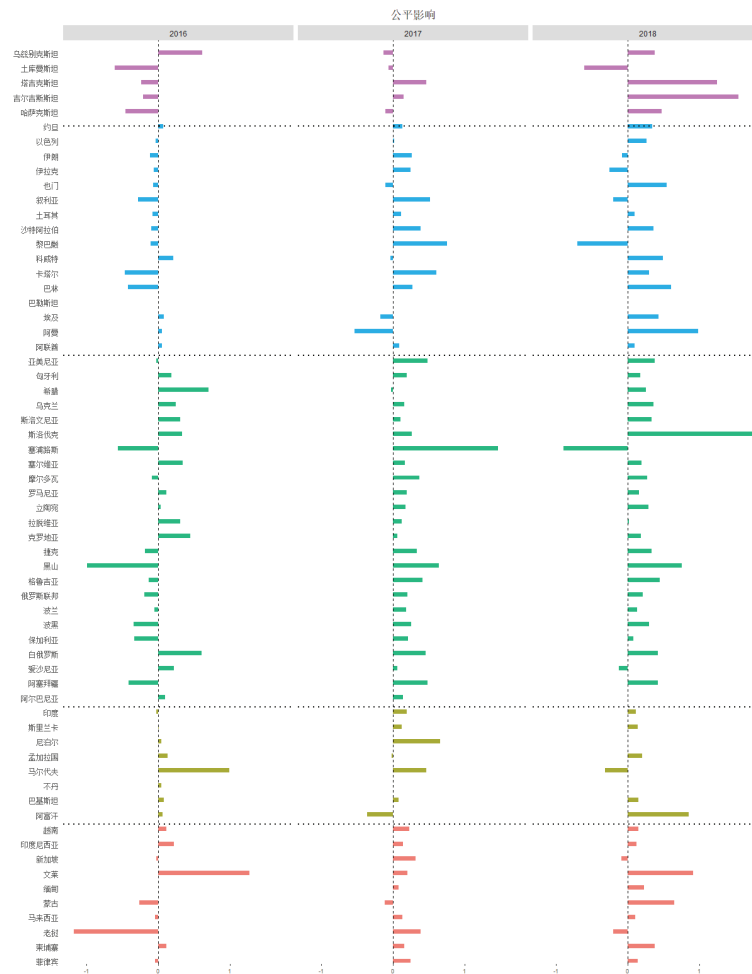
和一些正在经历转型的地区（如前南巴尔干地区）。这呈现了发展与安全这两大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一项经济倡议，也是一项全球治理倡议，不仅向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更为这些国家提供发展机遇。因此从长远看，“一带一路”倡议必将对沿线国家的稳定发展产生积极和正面影响。但也要清醒意识到，这一正面影响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其在短期内依然要受制于既有的安全矛盾（如教派、族群等矛盾）的影响。因此在短期内，上海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具有较严重结构安全冲突的地区（如西亚北非地区）的经贸合作还不能立刻扭转此地区既有的冲突与矛盾，这就导致在一些具有严重的历史冲突的“一带一路”国家，上海与该国的经贸合作可能暂时无法转化为持续和稳定的正面安全影响。



(5) 平等影响程度

“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目标是促进沿线国家的发展，但“一带一路”倡议谋求的发展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式的发展，而是共同富裕和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谋求的发展不仅是单纯发展速度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更是财富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合

理分配，因此社会公平与平等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也是其不同于既有西方发展倡议的关键所在。为此，今年的报告在去年基础上，进一步衡量“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社会公平发展的影响。从数据看，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大部分国家的公平与平等发展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其系数的方向为正，但在所统计的三年中，几乎每一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国家系数为负（例如 2016 年的沙特、2017 年的孟加拉国、2018 年的巴基斯坦）。这一情况表明，经贸往来与平等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虽然发展可为平等实现提供必要的物质财富保障，但发展本身也可能带来贫富差距的增大。而“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虽从长远看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与更高程度社会公平的实现，但这一倡议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在短期内很有可能受到沿线国家国内政治和分配机制的影响，难以十分公平地惠及各阶层民众。当前，经济全球化正进入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拐点，既有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模式带来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阻碍了全球化发展。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虽然在理念上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但其实现方式仍以较为传统的贸易和投资为主，因此也会遇到既有全球化模式中的问题，进而导致其无法在相应的沿线国家发挥促进平等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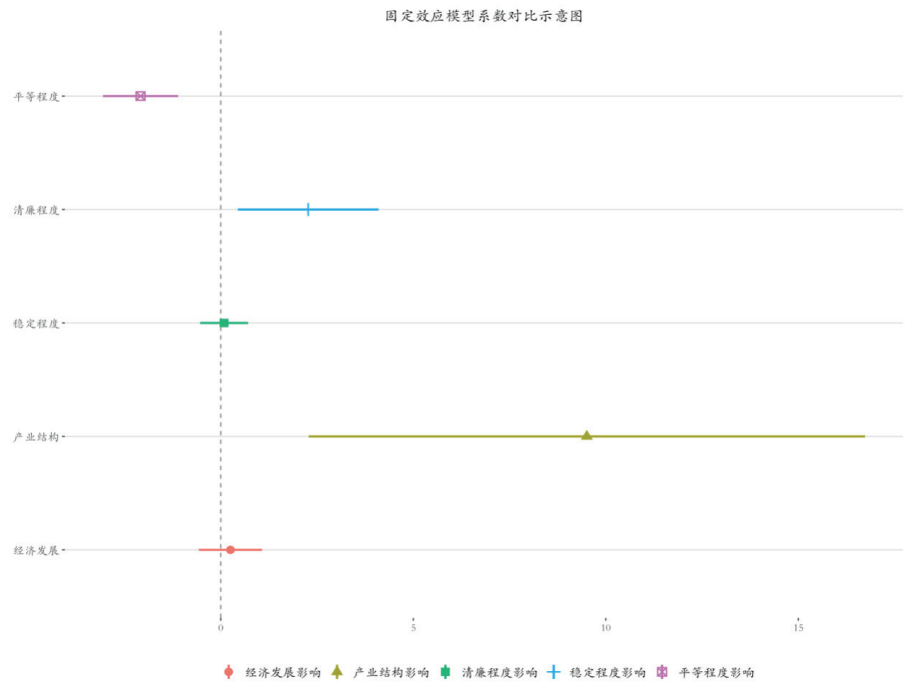
2、五大维度影响：固定效应模型

以上分析以共变模型为基础，从具体国别角度分析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在相应领域变化之间的关系。但共变模型虽可呈现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与相应国家发展变化的之间的方向性关系，但这种关系量化程度不够，因此无法得出其具体导致的程度。为了弥补共变模型这一短板，本研究引入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是统计学中处理同时分析兼顾横截面数据和历时性数据两种特征的面板数据库的常用手段，去年的报告也使用了固定效应模型来测算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相关维度上的影响大小。

根据固定效应模型，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在经济增长结构、国家稳定和和平等影响等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影响，这些指标表明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总体上可以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首先，在经济结构上，上海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贡献度与经济增长结构，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出显著效应，并且其系数也相对较大，为9.5。这表明在这一指标中，每当上海在某个沿线国家的投入增加一个单位，其相对应经济结构中的工业化程度也可增长近10个单位，这表明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助于相关沿线国家提高经济增长中的工业水平。第二个有显著影响的指标是国家稳定，这一指标同样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显著，并且为指标数量为2.27，这说明当上海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参与度上升1个单位时，相应国家的国家稳定程度也可提高2.27个单位，这表明上海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工作，与有关国家国内稳定程度的提升有着正向的相关关系。最后一个具有显著关系的指标是平等程度，此指标在99%的显著性水平呈现出显著性水平，并且指标为-2.085，由于测量平等维度的指标中数值越大代表平等程度越低，因此，此处指标说明当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程度上升一个单位时，其相应的平等程度也可以对应改善近2.1个单位。

	因变量:				
	经济增长 维度 1	经济增长结构 维度 2	清廉 维度 3	国家稳定 维度 4	平等 维度 5
贡献度	0.251 (0.418)	9.507** (3.685)	0.085 (0.317)	2.270** (0.931)	-2.085*** (0.498)
Observations	184	171	185	185	185
R ²	0.003	0.058	0.001	0.046	0.126
Adjusted R ²	-0.508	-0.470	-0.507	-0.438	-0.319
F Statistic	0.361 (df = 1; 121)	6.657** (df = 1; 109)	0.073 (df = 1; 122)	5.943** (df = 1; 122)	17.551*** (df = 1; 122)

*p<0.1; **p<0.05; ***p<0.01



3、总结

根据以上两个模型的讨论，可以看出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入在过去一年比之前产生了更为深远和积极的影响。首先，与过往几年相比，本研究设计的大部分指标都保持了积极正面的关系。数据分析同时表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上海对该国的相关投入等产生了正面积极的关联，这些现象都说明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正在丰富这一倡议的正面内涵，提升其贡献公共产品的质量与效益，为沿线国家和其民众实际生活的改善做出重要贡献。其次，本数据指标也表明，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正逐步深化，从最初的经济领域逐步向社会与公共政策领域拓展。固定效应的模型表明除了在经济发展结构的维度之外，在清廉程度和平等程度等维度中，上海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投入都与相关国家的发展之间产生了正面和明显的影响，这些说明“一带一路”倡导的发展理念，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发展理念，更是一种全面和共同的发展理念，最终要以沿线国家的综合可持续的社会进步为根本性的目标。

当然从数据分析中也可看出，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一些维度上尚存在不足，并且在具体国别中也会存在不同的差距，例如在平等程度、稳定程度等方面，上海服务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与不少沿线国家相应维度的改善就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对应关系，这虽然在相当程度上与所在的国家内部发展情况有关，但也说明上海需进一步加强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部情况的理解，才能更有效地发挥自身优势，更好地为沿线国家的整体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政策建议

今年数据分析表明，过去一年内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重要突破。一方面，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在投资和贸易等领域有进一步发展，提升存量，拓展范围、优化种类；另一方面，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也在逐步超越单纯的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与公共政策领域，为在未来更好地促进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本报告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对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冲击，促进上海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与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枢纽。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一带一路”倡议产生全面冲击，既有贸易和投资模式都面临重大调整。在此背景下，上海要立足自身特色，以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为基点，以自身制度性开放为抓手，从过去单纯服务“一带一路”开放，向如今以自身改革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转变。

第二，在贸易畅通领域，上海应巩固当前出现的平衡局面，同时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质产品的挖掘，利用当前全球经济调整的契机，提升“一带一路”地区/国家在上海总体对外贸易结构中的比重。从趋势上看，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平衡情况进一步改善，反映了沿线国家的优良商品正在逐步为上海市场所接受。但是，在上海总体外部贸易结构中，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七国集团依然占据主导，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虽保持了稳步追赶的态势，但相关差距并未缩小。因此，在未来发展中，上海应进一步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秀商品的挖掘，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契机，利用上海自贸区平台，逐步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质商品与上海市场相接触的渠道。同时，伴随当前全球总体贸易格局的深刻转型，传统美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将在未来出现更多矛盾与冲突。在此背景下，上海有关部门应在积极应对与美西方贸易摩擦的同时，向上海市场与市民积极推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秀公司、商品与优质旅游目的地，增强相关国家在上海的知名度与好感度。可考虑在进博会期间专门主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质商品进上海的相关活动，可利用相关新闻媒体、社交网络自媒体等主动宣传推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品、旅游和风土人情等，多策并举，共同推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上海的认可度与好感度，提升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能级。

第三，在投资领域，上海需进一步发挥自身特色，打造自身品牌，将“四大品牌”建设与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以特有质量优势而非简单的数量为依托，

打造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当前，上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地区/国家都建立了较强的投资关系，在全国位居第一集团，但与其他位于前列的省份相比，上海在覆盖国家范围、投资国家数量等方面都并不占优势，并且其投资企业与其他省份的对外投资企业也较为重叠。上海应积极发挥自身特色，将自身品牌建设与企业对外投资相结合，以高端制造、信息产业等高科技行业和相关的金融和商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为上海投资“一带一路”沿线的主要品牌，充分发挥独有特色，将“四大品牌”建设的成果直接转化为建立“一带一路”桥头堡的优势。

第四，上海应进一步发掘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影响，建立系统管理模式，对“一带一路”项目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估和引导。伴随着全球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传统的以单纯利润和财富累积为唯一目标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发展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不仅成为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外部效应，更成为制约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上海要实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高度关注相关项目对所在国社会公平、政治稳定等方面的影响。上海可以委托相关有资质的智库与学术机构，设立专门的“一带一路”社会影响评价指标，并组织专门机构对上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项目进行调研，将本报告提出的项目影响评估维度，进一步微观化和实时化，定期发布相应评估报告。同时，还应积极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信息技术，对“一带一路”倡议中涉及上海投资和上海形象的海外舆情进行定期跟踪和汇报，把握上海在外项目与所在社区、城市之间的关系；将上海友城工作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上海企业挂钩，经政结合，将海外投资项目与友城推介结合，主动激发我在外投资项目的正面社会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SHANGHAI ACADEMY
上海研究院